



朱杰勤 著

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中國和伊朗關係史稿

朱杰勤 著

中國人民出版社

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

朱杰勤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,125印张 2插页 60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300

ISBN7-228-00835-9/K·68

定价：1.00元

自序

两千二百年前，我国和伊朗已经建立外交关系，使节往来，载于史册。以后两国人民往来频繁，和平共处，双方进行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，收到互助互利的良好效果。在历史上，中伊两国一贯只有交好而没有交恶；只有玉帛相赠而没有兵戎相见。中伊友好关系历久不渝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

可是，我国至今还没有全面论述中伊关系史的专著出版，这个空白应该迅速补填。近年来，我虽然以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为研究方向，但对于中伊关系没有深入研究，故迟迟不敢下笔。

数年前，在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下，我接受有关方面的委托，担任撰写一部简要的中伊友好关系史。我于是搜集和参考中外典籍百数十种，夜以继日，搜索枯肠，费时三月，写成了《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》一书，约七万言。初稿告成后，复制数十份，广泛征求学者们的意见后全面作了修改。为审慎起见，后来我又修改一遍，希望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。近年来，由于我负担的行政工作、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较为繁重，没有时间顾及这部旧稿的出版问题，惟有束之高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本书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实事求是，进行撰写的。希望能够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做些工作。此书以正面叙述为主，行文力求通俗易懂。对于史实的解释和评论，往往寥寥数语，达意便止。作者

的任务是如实地反映历史情况，由读者自出心裁，加以判断。见仁见智，是在读者。又此稿草创时，引用资料的出处本有注明，可是本人不慎，失去注文，所借参考书籍，亦都已交回原主，难以查明补上，至以为歉。

今天，重温两千多年来中伊友好关系的历史，将有助于增进中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，加强两国人民的团结，并有助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。数年前，有一位伊朗专家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。他提议：中国学者把有关中伊关系的中文资料搜集出来，伊朗学者把波斯文资料搜集出来，合成资料汇编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中伊两国学者合作，撰成完备的中伊关系史。这个建议，闻者赞许，后因条件未备，暂作罢论。拙作仓促写成，囿于见闻，挂一漏万，仅供参考而已，其中错误不足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指正为幸！

新疆人民出版社一贯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十分重视，并给予大力支持，惠然印行拙稿，作者于此表示感谢。

朱杰勤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

目 录

一	中伊友好关系的开端.....	(1)
二	五至八世纪中伊两国的政治联系.....	(7)
三	古代中伊两国的陆海交通.....	(14)
四	伊朗人在中国进行贸易和生活的情况.....	(21)
五	十四、十五世纪中伊旅行家和外交家互相访问及其著作.....	(25)
六	中国物产和技术传入伊朗.....	(36)
七	伊朗传入中国的植物及其他.....	(42)
八	伊朗古代宗教及其对中国的传播.....	(48)
九	伊朗艺术作风对中国的影响.....	(58)
十	中国绘画与伊朗绘画的艺术联系.....	(68)
十一	中伊陶瓷艺术和纺织艺术的交流.....	(76)
十二	伊朗传入中国的球艺和乐器.....	(85)
十三	伊朗古代文艺作品在中国.....	(90)
十四	中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.....	(95)

一 中伊友好关系的开端

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的古老国家，各自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。它们虽然被高山、沙漠、激流和重洋所阻隔，但横贯东西的“丝绸之路”和南中国海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，自古就将两国紧密地联系起来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两国人民就结下深厚的友谊，两国政府也展开外交活动。

据中国史籍记载，中伊两国政府的接触始于公元前二世纪末，中国西汉（公元前206—25年）武帝刘彻（公元前140—87年）统治时期，也是伊朗史上帕提亚（Parthia）时代。因为帕提亚的建国者为安息一世（Arsaces I），波斯人称为Ashk（公元前249—247年），所以那时中国称伊朗为安息。

早在两国政府发生关系以前，两国人民已经通过中亚大草原相互往来，开展贸易了。他们深入彼此国境，了解对方国情，熟悉交通路线，这就为政府间的直接联系创造了条件。人民群众是中伊友好关系的真正开拓者。那些播下友谊种子的两国先人们，虽然没有留下姓名，却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。

中国和安息建交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。西汉前期，中国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出兵南下骚扰，抢掠人

口财物，奴役和侵扰西部边陲的一些城国，向这些城国勒索繁重的赋税，拦截商队和使节，阻塞中西交通。汉武帝即位后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，并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。从公元前129—119年的十年之间，西汉政府与匈奴进行过十多次战争，终于打败了匈奴，解除了匈奴长期以来对汉朝和西部城国的威胁，打通了通往西方的道路，保障了来往商人和使节的安全。

西汉政府在大规模进攻匈奴以前，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率领使团前往西域（西域的名称，在汉代专指天山南路诸国），企图联合被匈奴压迫和奴役的诸小国共同对付敌人。张骞中途被匈奴捉住，拘留了十年才逃出来。张骞到西域后，先访问大月氏（Idoscythe）。大月氏最初游牧于敦煌、祁连山（南山）之间，因受匈奴压迫，就由天山北路经伊犁河流域，到达妫水（Oxus），征服了妫水附近的大夏（Bactria），并建都于妫水之北。张骞长途跋涉而至于此。经历了许多国家，熟悉了西域的政治、军事、地理、文化，风俗习惯等情况，为下一次通西域打下了基础。

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派张骞率领三百多人组成的使团，携带大批金银丝绸礼品，第二次出使西域，访问了许多国家。当时，张骞曾派副使访问安息，受到很好的接待。西汉和安息两国政府就是在这个时代建立了关系。从此以后，汉朝与安息的使节往还频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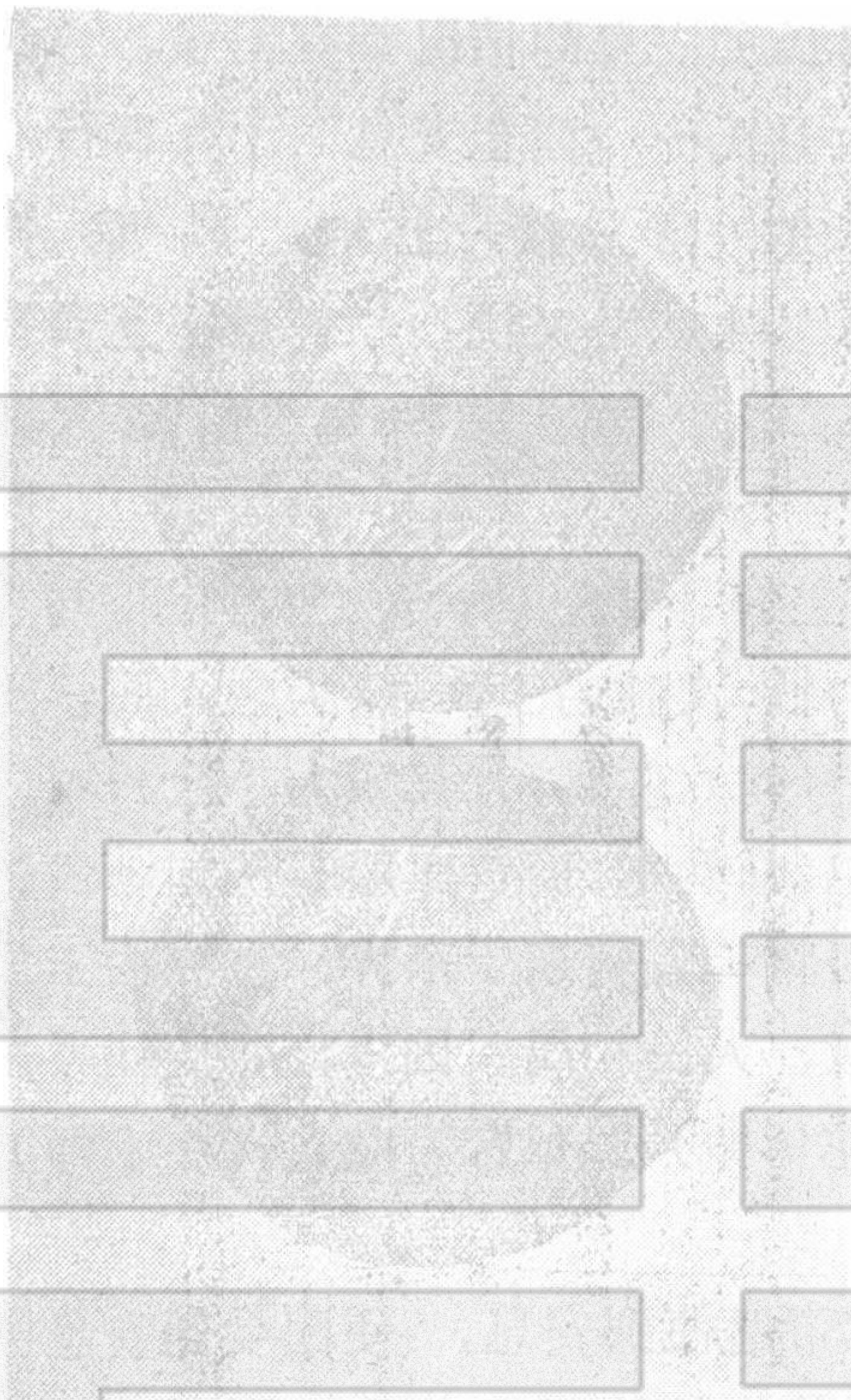
安息是大月氏的西邻。中国史家根据使者的报告和

商人的见闻，对于大月氏和安息的情况都有记载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说：“大月氏……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，南与罽宾（在今克什米尔一带）接；土地、风气、物类，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。”又说：“安息国王治番兜城（Parthava）……北与康居，东与乌弋山离（即Alexandria亚力山大城，在今阿富汗之赫拉特Herat），西与条支（叙利亚）接，土地、风气、物类，所有民俗与乌弋、罽宾同，亦以银为钱，文独为王面，幕为夫人面，王死辄更铸钱。有大马爵（雀）（鸵鸟）。其属大小数百城，地方数千里，最大国也。临妫水。商贾车船行傍国。武帝始遣使至安息，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，行比过数十城，人民相属。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，以大鸟卵（鸵鸟卵）及犁靬^①眩人（魔术师）献于汉。”

这段记载指出汉武帝遣使到安息，使团受到安息国王和安息人民极其隆重热烈的接待。安息并派使回报。这是古代中伊两国结交的第一次记载，值得我们珍视。

当时安息在密斯利得斯二世（Mithradates II，公元前127—87年）（图一）统治下，国势强盛，据有妫水之西，黑海之南的广大地带。所以中国史书称：“其

① 犁靬是什么地方，近代学者还没有一致意见，有人说犁靬就是Rekem，即条支的一个港口底特拉（Petra）（今属阿剌伯），有人认为犁靬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简译。这个城市文化高，商业盛，幻术也很著名。当时属于罗马帝国范围。以赞同后一说的较多。



图一 安息银币与王像

属大小数百城，地方数千里，最大国也。”

安息是东西贸易的枢纽。贯通东西著名的

“丝绸之路”是通过安息的。许多商队沿着这条商路把罗马帝国的青铜器、玻璃器、酒、油，特别是黄金，从高卢(Gaul)运到中亚、中国和印度，来换取丝绸、象牙、香料和宝石之类。西汉和安息两个国家建立了直接联系，共同维持商路的畅通，这对促进和加

强东西各国人民的交往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，都是极为有利的。

随着政治上的联系和经济交流，两国文化也必然互相影响。例如上文提到安息使者把犁靬眩人送来中国，对中国固有的幻术发生一定的影响。中国古代广泛流传过一些杂技节目，如“口中吐火”和“用绳自缚自解”等魔术节目，有人认为就是通过伊朗传入的。还有一个在叠放着的多张案上由艺人表演的节目，叫“安息五

案”。它以安息为名，可见是从古代伊朗移植过来的。

中国的冶铁技术在西汉时代就传入安息地区。《史记·大宛传》说：“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……其地皆无丝漆，不知铸铁器，及汉亡卒降，教铸作他兵器（他兵器指弓矛之外的其他兵器——引者）。得汉黄白金（主要指铜锡——引者），辄以为器，不用为币。”据颜师古注，教他们铸铁的还有使团中人。

西汉末年，中国爆发了农民大起义，西汉王朝随即覆灭。公元二五年，西汉豪族刘秀建立东汉王朝（公元25—220年）。中国王朝的更替，并未影响中伊两国的友好联系。东汉章帝刘炟章和元年（公元87年），安息国王佛罗格斯二世（Vologases II）遣使到中国，赠送狮子、符拔（独角兽 Unicorn），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。汉和帝刘肇永元九年（公元97年）派班超出使西域，他遣副使甘英聘问大秦（罗马帝国）。甘英已到安息西界，想从波斯湾渡海，但以不明情况而止。到永元十三年（公元101年），安息王满屈（Pacorus）又派使者来中国，并送狮子及条支大鸟（当时安息人称为“安息雀”）。

这时期，中国古书也记载了一些长期居留中国的安息人，例如早期到过中国宣传佛教的外国僧侣中，就有安息人安清和安玄。

佛教于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国。到东汉时，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，发展颇为迅速。

安清字世高（Parthamasiris），是安息国王满屈二世的太子。他舍弃王位，出家为僧，历游印度等国，于公

元148年到中国。他通习汉文，从梵文佛经中译出三十九部，时称“义理明析，文字雅正”。

稍后于他的安玄，于公元190年来到东汉首都洛阳，与中国僧人严佛调共同译经，由安玄口译梵文，佛调笔受，亦著称于时。

这些事实说明，在两汉的几百年间，中伊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往来是频繁的，相互影响是多方面的。这就为以后进一步扩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和增进人民友谊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二 五至八世纪中伊 两国的政治联系

约从公元二世纪后的三百多年间，中国史书没有记载中伊两国政府的交往活动。这种沉寂状况是与当时中伊两国的政局有关的。在这期间，中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定。公元184年，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，给腐朽的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，使它的统治渐趋瓦解。不久就形成了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（公元220—265年）的局面。在西晋（公元265—317年）统一全国的短暂时期，又内战不休。不久，晋宗室在中国南方建立东晋王朝（公元317—420年）。接着是各民族统治集团的长期混战，从公元420—589年，形成南北对峙的所谓“南北朝时期”。在这段时间的前期和中期，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忙于割据和纷争，无暇派遣使节到远邦修好。

同一时期，伊朗也有和中国类似之处。安息王朝末期，内忧外患严重，局势极不稳定。约在公元211年，法尔斯省（Fars, Pars）萨珊（Sasan，古波斯文，是领袖的意思）族的头人阿尔达希尔（Ardeshir）举兵独立，于公元226年推翻了安息王朝，建立了统一的萨珊王朝，他的一生致力巩固中央政权。他的儿子沙卜尔一世

(Shapur I 公元240—272年)，继位后忙于对付外族的入侵。沙卜尔死后，统治阶级内阏，一百年中换了一系列君主，中央失权，国势不振，又须抵抗罗马人的压迫和贵霜人（Kushans立国于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（Peshawar）的游牧民族）的入侵。在这样动乱的情况下，伊朗也不可能派使聘问中国。

虽然中伊两国政府间的联系暂时中断，但民间还是往来不辍的。例如伊朗的佛教僧徒昙谛（Dharmabhadra法实）和安法贤（Dharmasatya）先后于公元254和265年来到当时中国的魏（公元220—265年），和西晋（公元265—316年）的首都洛阳，翻译佛经多部。东汉末年，汉灵帝（公元168—189年）很喜欢“胡物”（胡，是中国古代对外国的通称），诸如胡服、胡帐、胡床、胡饭、胡乐、胡舞、胡箜篌等，不一而足。贵族大官争相仿效，成为一时的风气。这些外国的东西，也包括来自伊朗的。例如竖箜篌，就是由伊朗传入中国的（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）。这说明，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仍在继续进行。

公元439年，北魏（公元386—534年）统一了中国北部，社会又趋安定，东西交通再度畅通。多年断绝联系的中伊两国政府又恢复了交往。公元589年，隋朝（公元581—628年）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，中国又归于统一。代之而起的唐朝（公元618—907年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，在它的前期，政局稳定，国力强大，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。与这时期约略相当的伊朗萨珊王朝公元（211—651年），也是古代伊朗的极盛时

代，经济文化也都非常发达。就在这个时期，中伊两国交往频繁，民间联系更加紧密，出现了中伊友好关系史上新的高峰。

公元439年，北魏统一了中国北部，取得暂时安定，中伊两国使节往来更多。根据《魏书》记载，公元455—522年，萨珊王朝遣使中国几十次，每次都受到北魏王朝的隆重接待，而且根据中国封建王朝对待友邦的惯例，遣使回报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西域人入居中国首都以北魏一代为最多。据魏杨衒之撰的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记载，流寓洛阳的外国人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，有万余家，这当然包括一部分波斯人。北魏时期，中伊两国交换使节的频繁，民间的友好往来自然相当密切了。

北魏统治者崇奉佛教，大兴寺院，在洛阳城内建筑永宁寺，为天下第一。有一位波斯僧人菩提达摩，来游洛京，前往巡礼，见此寺精丽，为五印度所无。合掌赞叹不已。（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）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韵事。

公元535年，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。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（Khosro I 公元531—579年）于553年派使团到西魏。波斯典籍也记载这位大王在位时，中国皇帝遣使到波斯并赠送礼品。

从这个时期开始，中国史书称伊朗为“波斯国”，（首先见于《魏书·西域传》），而不沿用安息的旧名。为什么把伊朗称为波斯？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历

史。

约在公元前一千年，有大批游牧于高加索和幼水附近的民族从黑海方面进入伊朗，又移植于波斯湾北面的山区，他们把这个地区称为波斯（Parsa, Persia），即今之法尔斯（Fars）。以后人口众多，势力强盛，因而立国。新朝的建立者，波斯人称他为黑哈曼尼殊（Hakahmandesh）。希腊人称为阿开密尼（Achaemenes）。他的新朝在历史上称为阿开密尼王朝。他的后人居鲁斯（Cyrus, Kuros）是波斯帝国的建立者。他死于公元前529年。伊朗政府为纪念他，于1971年10月举行了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。我国派出特使参加，受到伊朗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。

约在公元211年，法尔斯省（古波斯）萨珊族的头人阿尔达希尔（Arcleshir）举兵独立，于公元226年推翻了安息王朝，建立了统一的萨珊王朝。萨珊王朝自称属于阿开密尼王朝的系统，同时他的事业又起源于波斯（Parsa）地方，所以在国际间通用波斯一名，传到远东的中国。

萨珊王朝库思老巴维斯（Khosro Parviz）在位时，隋炀帝杨广（公元605—618年）曾派以李昱为首的中国使团往波斯，波斯又派使团随李昱到中国回报。

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势力大盛，634年开始侵入伊朗，在兵戈扰乱之际，638年萨珊王朝还派使者带礼物到中国。萨珊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伊嗣俟三世（Yazdgerd III）战败逃亡，于伊朗东部被杀，伊朗成为阿拉伯帝国的

一部分。萨珊王朝的遗族流亡在外，据地反抗，或在边远地方成立小朝廷，企图光复旧业。例如伊嗣俟之子卑路斯（Firuz）及其部下在吐火罗组织政府，失败后，带着他的儿子泥涅斯（Narses）客居唐朝首都长安，先后死于中国。其余在西亚和中亚割据一方的波斯国领袖多与唐朝保持传统的友谊，由公元661—762年一百年间，派使节来中国二十三次。此外在黑海南面的陀拔斯单（Tabaristan）的波斯大将，于公元746年遣使到中国，八年后又派他的儿子来中国聘问，均受到唐朝的热忱接待。

这个时期，不少波斯人和波斯人后裔在唐政府供职。例如陀拔斯单大将的儿子就留在唐宫廷服务。在此以前，波斯酋长阿罗憾于公元658年出使中国，留在唐朝服务，唐高宗派他出使东罗马等国，称职有功，给予将军和公爵封号。公元710年以九十五岁的高龄死于洛阳（在洛阳已发现了他的墓碑）。

还有出生于波斯大族的苏谅，曾在唐朝任“左神策军散官马使”，长期留居中国。1955年，我们在西安发现了一件汉文和中古波斯文合璧的其妻马氏的墓志。唐代中期将领李元谅是波斯人后裔，御赐姓李。唐朝统治者姓李，赐以皇姓，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是一种荣宠。据史书记载，李元谅身躯高大，美须髯、勇敢多计谋，年少从军，为宫廷侍卫，后屡建战功，升至上将军，当时称为名将。

一些波斯人和波斯人后裔在唐政府任职，反映了古